

XINZHIDUJINGJIXUEZAI DANGDAI

新制度经济学 在当代

■ 李同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XINZHIDEGONGXUEJIEZAIPIANDAI

新制度经济学 在当代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李同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16—03868—1

- I. 新…
- II. 李…
- III. 新制度经济学
-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151 号

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

李同明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荆州市石地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5

字数: 535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定价: 58.00 元

书号: ISBN 7—216—03868—1/F·691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作者近影

李同明，湖北农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经济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津贴和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管理科学院兼职教授。曾被中国教育家协会授予“中国杰出教育家”荣誉称号。同时担任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农经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教育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科协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新制度主义应用丛书

编纂委员会成员

顾 问：厉以宁 张培刚 胡代光 谭崇台
主 任：李 同 明
副主任：谷书堂 雷海章 张德修
委 员：蒋学模 卫兴华 刘方棫
 汤在新 刘光杰 杨在新

[厉以宁(北京大学)、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胡代光(北京大学)、谭崇台(武汉大学)、蒋学模(复旦大学)、谷书堂(南开大学)、汤在新(中山大学)、张德修(北京大学)、刘方棫(北京大学)、雷海章(华中农业大学)、刘光杰(武汉大学)、杨在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均系国内著名经济学家。]

序

李同明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一书的出版,是对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我作为作者的师长与长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甚感欣慰,并对此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发展经济学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将制度分析的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相结合,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把制度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又将新制度经济学称之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稳定偏好和均衡分析的前提下,重新研究与估价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将传统理论中假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等视为亟待解释的关键性变量,并侧重研究这些变量同经济效率的相关性。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又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具体表现在:

1、从交易费用与制度结构上填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空白,为外部性、福利损失等问题找到了解释的理论依据。伴随新制度经济学揭示出经济现实中的交易费用为正数而不为零这一客观事实,正交易费用的外部效应、福利损失等问题,便找到了真正的解释的依据。

2、从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和产权关系的角度上,矫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不正确的结论。如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公平与效

率的可分离性问题,由于交易费用为正数,产权关系存在与信息不对称,会直接影响经济效率,因此,此公理不再成立。

3、高度评价了组织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既反对自由主义学派的“市场自动调节论”,也反对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计划体制的“政府干预论”,而独特地提出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将足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作为第三种资源配置手段,这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经济效率的十分有效的配置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正因如此,制度结构变迁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4、新制度经济学摒弃新古典经济学旨在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模式,重塑一种使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与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相协调的“完全经济人”假设模式。回顾过去一百多年,制度经济学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制度经济学,即旧制度经济学——庸俗经济学中的改良学派的制度经济学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庸俗经济学派中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为代表的——一个改良学派,主张通过适当改良集中垄断的生产制度来缓和矛盾,从而为垄断资本服务。此乃旧制度经济学或早期制度经济学。其首创代表人物除凡勃伦之外,还有康芒斯、密·契尔等。此学派盛行于上世纪20~30年代,但凯恩斯主义自20世纪40年代盛行以后,旧制度经济学却被视为异端沉寂了三十年。

第二阶段:现代制度学派。上世纪70年代初,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以“滞胀并发症(综合症)”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危机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凯恩斯主义不仅无法医治“滞胀并发症”,而且无视制度作用,无视技术进步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制度主义重新复活,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为

首创代表的“现代制度学派”，针对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的经济危机特点与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新的改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理论。“现代制度学派”新理论的要领是：从结构或制度上分析资本主义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之源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并以此为据提出改良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政策建议；主张经济学与社会学合流，应当“社会学化”；强调国家调节作用与“技术决定论”等。

第三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为首创代表。他先后于1937年发表了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论文，首创性地引入了交易成本——产权分析思路，阐述了制度体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从而奠定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后来，在诺思、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围绕交易成本——产权与科斯定理等核心范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来，并历经几十年的演变不断充实与发展。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独树一帜，发展成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与时俱进，创新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使发展经济学冲出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僵局，赋予其崭新的生机与活力。

(1)首次揭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开创性地提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源泉”。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这是争论了两三百年的古老而常青的经济学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财富或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或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有的认为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有的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源泉等等。历

济增长的关键这一重要的经济学规律,有着划时代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既是对早期的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使其走出了旧制度主义陈旧的思维框架,又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使其走出了新古典主义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模式框架。新制度经济学还使新古典主义走出了纯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而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道德哲学等结合起来,故又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范式(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与工具——理性人假定、稳定偏好和均衡或最大化分析)里重新研究与估价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将传统理论中假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视为亟待解释的关键性变量,并侧重研究效率的性质与结果如何与这些变量相联系。

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十分通晓现代经济理论并能熟练地运用它分析约束条件下各种制度选择,而旧制度经济学家却难于做到且往往前后发生逻辑矛盾;

其二,新制度经济学十分注重现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交易(制度)成本的存在,且把它视为首要的约束条件,而旧制度经济学家却看不到现实世界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因而不可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正确的制度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摒弃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经济生活现实的纯理性地追求个人财富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模式,或者说摒弃建筑在人的行为无限理性假设基础上的,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模式,而是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经济世界,构建一种建筑在人的行为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使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与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相协调的“完全经济人假设”模式。

取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人假设”模式的理性是一种无限理性假定,是脱离客观经济现实的,现实中的经济人理性是有限理性,是有边界的。因为现实中经济人理性受制于主观计算、认识、预测能力的有限性和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故不可能为所欲为。三是有由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性、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日趋严重,信息成本、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因此,为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经济绩效,发展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超经济因素的内生性研究。四是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的“矫正制度”的重大作用,使经济发展的主题从传统的“矫正价格”转变为“矫正制度”。

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矫正价格”到“矫正政策”,再到“矫正产权”,最后确立“矫正制度”,这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与突破,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实践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走出困境、开辟新的发展途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回顾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虽然各国经济普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债务包袱越来越沉重。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因素作为发展的内生变量的观点,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阻碍其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因素。说具体一点,主要是三大制度障碍因素:其一,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盲目实行“赶超”战略;其二,许多发展中国家机械搬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最为典型的是印度在二战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四十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其三,各个国家的封建文化传统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束缚。有鉴于此,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以新制度经济学为指导,进行制度变迁,破除传统制度文化的束缚,变

革与创新现代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产权制度、组织结构与文化传统,创立以提高经济效率与促进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产权制度、组织结构、法律体系与现代文化,并根据各国的实际,实行符合各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李同明教授所著《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一书的主要特点是:

一、严谨的理论分析与生动的实证分析结合。

就全书整体框架而言,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严密的结构体系。全书中第一篇系统严谨地阐述基本理论,第二篇与第三篇分别对这些基本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应用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基本理论部分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所做出贡献,交易成本理论,产权制度理论,经济组织理论,契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制度与相关关系理论等。第二篇是运用第一篇所系统论述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二战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从制度结构上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制度变迁的演变,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演进等。在对发展中国家战后经济发展从制度结构上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把一般分析与典型分析相结合,重点解剖了印度、新加坡与中国的香港及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演化及其经验教训。第三篇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从制度结构上进行实证分析。这是全书的重心之所在。此篇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中国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与变迁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对中国二十五年改革开放中制度变革理论的演变,二十五年来中国所有制、财税制度、外贸制度、金融制度、商品流通制度、价格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经济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等十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

的制度变迁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热点问题的制度结构等进行了辨析。

二、严密的规范性与鲜明的创新性结合。

此书中无论是理论研究或者是实证分析,都始终坚持严格的规范性程序,逻辑层次分明,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关于理论体系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各个理论范畴概念的定義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推理等都十分严谨,范畴的边界都十分明晰。实证分析中,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说理透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书中把规范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把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精神相结合。

三、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提出的对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

第一,此书在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大胆提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的基础上,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从制度结构上深入地、系统地剖析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实践,探索了未来制度变迁的出路与对策。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用于对实践中的制度结构分析与对策研究,所提出的对策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比如第二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转变与战略类型的演变;其次精辟地概括了发展中国家“两轮制度变迁”的要点;再次通过解剖印度、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探寻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制度结构变革的基本走向与基本对策,全面论述了制度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范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済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制约因素和可能发生的需要正确处理的冲突,其中突出地剖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人治制度文化在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在

当代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危害与阻碍,颇具指导意义,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二,概述了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历史进程与战略对策,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较清晰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第三,在系统回顾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理论演变的五个阶段的基础上,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成本、产权制度、经济组织结构、企业组织、制度变迁、国家与市场等理论原理与分析方法,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十个领域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对这十个领域的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论述,不仅理论分析透彻,创新性强,而且所推出的对策中肯实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与可操作性。最后对近两年来,即党的十六大前后我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十个热点所进行的深入的制度结构分析,其针对性、实践性也较强。

李天明教授在高校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几十年,同时担任大学校长几十年。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他从不放松学习与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以求、手不释卷,日以继夜地挑灯夜读,如饥似渴地贪婪“食书”,不辞辛劳地深入基层考察与学习。正是这种不懈追求的精神与百折不挠的惊人毅力,使他畅游于浩瀚的学术海洋,登攀于智慧的书山。在过去四十年中,他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先后出色地担任四所大学校长长达二十二年,而且在学术研究上跃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他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晋升为教授,担任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湖北六个省级学会的正副会长,还先后受聘为 10 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兼职教授,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津贴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教育家协会授予他当代中国教育家荣誉称号。特别是科研成果累累、成就卓著,迄今已完成中央与地方各级科研课题 25 项,先后荣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三等 8 项,出版专著 21 部,发达论文 300 余篇。目前,他在所从事的农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等

三个领域的造诣甚深,已步入理论前沿,在湖北省及国内理论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近五年来,他涉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都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祝愿李同明教授沿着他已经开辟的科学之路一往无前,终身奋斗,为祖国的经济科学与教育科学事业做出更加杰出的新贡献!

2003年8月于北京大学

前 言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称新制度主义，是上世纪末兴起的新兴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并列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支柱。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不仅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发展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历时态上分析，回顾上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归根结蒂都是一部制度变迁史。纵观上世纪百年世界经济史乃至上溯几千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都已胜于雄辩地证明：通过制度变迁（暴力或非暴力）革除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刚性制度障碍，创建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弹性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古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

从现时态上分析，世界各国发生于世纪之交 20 年左右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的变化说明制度变迁仍然是当代与 21 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源泉。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已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斗。这充分证明制度创新、体制变迁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源泉与动力。事实之二是苏联东欧的“八九剧变”证明，僵死的计划体制

已成为苏东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把苏东各国经济带入死胡同，是导致其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基本内在原因。事实之三是，在美国出现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10 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冲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主义理论禁区，走出了上世纪 70 ~ 80 年代的“滞胀并发病”的陷阱，遵循新增长理论、新经济理论与新制度主义原理，大胆进行经济制度变迁，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制度基础与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出作为第三生产要素知识与技术持续提高投资收益的重大作用，从而使经济能长期地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为什么知识与技术在持续提高投资收益上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与技术和资本、劳动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非外生的），源于厂商投资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努力。知识与技术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它不仅不会产生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投资收益（报酬）递减情况，相反，它抵消甚至压倒了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所以，伴随知识与技术不断内生，即知识与技术存量的积累不断地增加与内涵也不断创新，第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便会递增，致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从而使经济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

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所发生的“10 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说明，在新经济时代，即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过程是经济知识化与知识经济化过程，简单地说就是知识与技术内生（非外生化）过程，惟有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推动知识内生、技术内生，才可能促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可见，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经济永续增长的动力与源泉。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知识与技术内生快慢，知识与技术量的积累度与内涵创新度的大小是受制于投资决策者所实行的制度基础，赖以的存在组织体系与运作机制的。实践证明，决策者只有实行一流

的制度政策与机制，才可能内生出一流的知识与技术，也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经济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制度重于技术。美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世纪之交1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经济决策上，实行开明开放政策，广泛吸引招揽天下科技上的高人，不断创造促使知识、技术内生化和不断创新制度、政策与机制，此乃其最重要、最核心的秘诀之所在。

本书研究的重心是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当代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本人在研究中，结合世纪之交我国与世界经济的**新发展、新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大胆探索当代新制度经济理论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提出了下述一系列新见解。

1. 大胆摒弃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模式，提出“完全经济人”假设模式。“完全经济人”假设模式有以下特点：

(1) 比较贴近经济现实，确立人的行为动机为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和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协调的行为动机；

(2) 人的行为由“经济人”的无限理性假定转变为“完全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假定；

(3) 摒弃“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推崇“完全经济人”的诚信形象；

(4) 追求个人财富不能为所欲为，而应在交易法规等游戏规则所确立的经济制度条件约束下去追求。在现实中，这种“完全经济人”追求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与社会财富相协调的个人财富最大化，即实际上所能实现的个人财富追求，不可能达到最大化目标，而只能达到次大化目标。

2. 提出制度结构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中介变量与运行机制：

(1) 制度通过确定规则，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来增强人们对